

康信詩賦選



卷之三

詩集選

# 庾信詩賦選

譚正璧 紀馥華選註

古 典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上 海

庚 信 詩 賦 選

譚正璧 紀曉華選註

\*

古 典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 152 弄 18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33 號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 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号 183

开本 787×1092 纸 1/32 印张 7 3/16 字数 145,000

一九五八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8,200 定价(7) 0.65 元

## 序 言

經過兩晉『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之後，飽經離亂的中國人民又進入了另一個混亂苦難的年代。這年代可以說是前一個年代的變本加厲的繼續。這時候漢族和已經被漢族同化了的北方民族的軍閥們進行混戰，大大小小數不盡的戰爭——看不完的烽火的燃燒，望不盡的血河的奔流。戰爭的鐵蹄無情地蹂躪着每一個善良的人民；也就在這時，那些統治者們（不論那一族）仍然對那只剩下皮包骨頭的人民繼續進行殘酷的勒索和壓榨，供他們過窮奢極侈荒淫無恥的生活。如梁武帝蕭衍和魏宣帝元恪都爲了自己迷信佛教，在各地大興土木，修建無數的佛寺（蕭衍光在建業就建有佛寺五百餘所，元恪在各州郡造寺廟一萬三千餘處），供養着大批寄生蟲——僧尼。至如齊東昏侯蕭寶卷爲潘妃建神仙、永壽、玉壽三殿，並鑿地鑄金蓮花，使潘妃行走其上的荒唐行爲，更是盡人皆知的。再一方面，天災——旱災、蝗災、傳染病等也接踵地降臨到人們的頭上，如梁武帝天監元年（公元五〇二年）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二年夏多癟疫。殘酷的戰爭，無情的壓榨，再加上連續不斷的天災，大地上已經呈現了『千里絕烟，人跡罕見』、『尸流滿河，白骨蔽野』的荒涼景象；人們過着流離顛沛，妻離子散，忍飢挨

### 餓的悲慘生活。

這是一個充滿了血和淚、憤怒和仇恨的時代！詩人庾信就是誕生和成長在這個時代裏。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今河南新野縣）人。生於梁武帝天監十二年（五一三年）。遠祖在周時爲掌庾大夫（掌管糧食的官），因而得姓。漢朝時，據詩人自己說也有作重要官職的。從漢到晉，詩人祖先世居潁川（在今河南省），後來才徙居新野。西晉末年，八世祖沿隨晉元帝司馬睿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並賜與田地，徙居於江陵（在今湖北省）宋玉故宅。庾信從建業流亡到江陵時曾住在此。高祖政爲宋巴郡太守；曾祖道驥爲安西參軍；祖父易，素性恬靜，不交外物，過隱居生活，屢被徵召而不仕；父親肩吾，聰穎絕頂，八歲即能賦詩，才華橫溢，周勝王追庾信集序說他：『文宗學府，智囊義窟，鴻名重譽，獨步江南。』可見他在當時文壇上地位之高。他曾在梁作過東宮通事舍人及諮議參軍等官。庾信就誕生這個地位高貴顯赫而文學氣息濃厚的官僚兼詩人的家庭環境中。

庾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其精通左傳，因此他在少年即享有崇高的榮譽。十五歲時就到宮中作昭明太子的侍從官，爲太子伴讀。十九歲時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

記，信和徐陵並爲抄撰學士。二人同時寫了許多綺艷的宮體詩文，世號『徐庾體』。父子二人甚得最高統治者——皇帝和太子的賞識和寵愛，可以自由出入宮禁。庾信不但有眩人眼目的才華，而且在軍事方面也有一定的才能，可以說是一個文武雙全的人才。卅歲時，他曾作郢州別駕使，和湘東王蕭繹在江陵商論中流水戰的戰術問題，那時安城郡劉敬躬起事，聞信之名德，皆四散而逃；而且出使東魏回來之後，他曾爲東宮領直春宮兵馬，並受節度。所以他自己會說：『居笠穀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哀江南賦，以後凡引自哀江南賦者皆不注。）詩人出使東魏報聘，是在卅三歲那年，由於他的優美的文章和智巧的辭令，甚爲魏朝統治者所器重和讚揚。詩人的青少年時代就是在這種充滿了榮譽華貴、無憂無慮的生活中度過的。甚至在晚年極端悲苦之時，他仍以得意的口吻，驕傲地描繪這段幸運的生活場景。

但是好景不常，詩人的幸運生活終於結束在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五四八年）侯景叛變之時。那時詩人是三十六歲。

侯景本是東魏軍閥，是個反覆無常的豺狼之徒，因懼禍降梁，武帝引狼入室，封他爲河南王。但他仍不安分，於太清二年八月間起兵叛梁。由於梁武帝耽於安樂，佞於佛教，不理政事，不修武備，大臣們對國事也不負責任，民心盡失；因此侯景兵由壽春南下，一路上勢如破竹，很

快地就打到國都——建業（今南京）。梁簡文帝命信率領宮中文武數千人繁營於朱雀航（即朱雀橋，爲都城正南朱雀門外之大橋），但是信的部下却望敵而逃，因此軍隊崩潰，朱雀航被敵人佔領。信退後，即潛跡西奔江陵，開始了他的後半生狼狽流離的生涯。他是冒着性命的危險，假借出使的名義而奔江陵的，一路要經過許多道關口，走不通，只好換走水路，順江直上江陵。正在詩人由水路上江陵時，侯景已陷了宮城，簡文帝大寶二年（公元五五一年）四月，景兵西上襲郢（今湖北武昌縣）。詩人在路上碰到了他們，情況非常危險，只好躲在江夏（在今湖北武昌縣西南黃鶴山上）。「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這就是他所描寫的當時避難的情形。七月，侯景被梁元帝手下將軍胡僧佑和居士陸法和擊敗，遁還建業，詩人才繼續他的行程。他以多末興奮的心情看到自己已經進入湖北省境，離開目的地越來越近了。但是當他上江陵一路上看到被戰爭的砲火破壞得「旅舍無烟，巢禽無樹」的慘狀時，不禁滾滾的淚珠沾濕了衣襟。

詩人終於到了江陵，住在城北三里宋玉故宅。這時他的父親肩吾也奔跑到江陵，他們見了一面之後，同年（三十九歲）父親就逝世。元帝未即位前，信爲御史中丞。承聖元年（五五二年），元帝派王僧辯等諸大將東伐侯景，並馳檄四方賞賜。三月，平侯景之亂，殺了侯景，傳首到

江陵。元帝命梟首示衆於市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付藏武庫。十一月，元帝即位江陵，信轉右衛將軍，封武康侯，加散騎常侍郎。元帝貪圖享樂，苟且偷安，不聽忠臣之言，不遷都金陵而都江陵；而且他驕傲自大，對比他稍強的人，即猜忌而加以迫害，曾殺兄弟和宗族多人。信整日畏讒，懼怕禍患，內心非常苦悶。『就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之句，很能表現他這時終日忡忡不安的心理狀態。

承聖三年（公元五五四年），庾信聘於西魏，出使長安。到了長安之後，魏相安定公宇文泰派了常山公子謹，中山公宇文護，率兵五萬，和帝姪蕭晉會合，攻伐江陵。江陵很快地陷於敵人之手。梁元帝出城迎降，蕭晉把他侮辱了一頓，用土囊把他壓死。魏俘虜了江陵王子王公以下十萬多人，趕到長安去給他們作奴婢，城中的老弱全被殺死。魏平江陵獻俘長安是在冬天十二月嚴寒之時，詩人的妻子、兒女、老母、親友等都被一起俘到長安，自然要向他訴說一路上所受的種種非人的折磨和重重難忍的痛苦。他萬分同情人民這種悲慘的遭遇，而對魏周統治者（尤其是宇文泰）表現了難以遏制的憤怒（如竹杖賦中的影射）。詩人在哀江南賦中曾以沉痛的筆調真實地描繪了江陵崩毀、人民慘遭屠殺以及被俘沿途所受的種種苦難。

庾信是江陵名士，素有聲望，爲宇文泰所器重。他把俘虜來的妻子、兒女、老母都還給庾信，

使他們團圓，並給他高官作。時信四十二歲，也就從此開始了他的和家國永絕的羈旅生活。

北周代魏之後，諸帝對他寵遇之盛，實在無與倫比。周孝閔帝時，信爲司水大夫，弘農郡守，又拜爲驃騎大將軍開府，進爵爲義城公。明帝、武帝時爲司憲中大夫，麟趾學士，洛州刺史，位望可以說是通顯之極。他們都雅愛文學，非常尊重他。至於北周諸王，也都把他當上賓看待，和他關係非常密切。他們都喜歡他的作品，並向他學習，如趙王招就是學庾信體的。滕王道還給他編全集，爲全集作序。序中說：『余與子山夙期款密，情均縞紵，契比金蘭。』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關係。因爲文章寫得好，王公們的碑誌許多都是托他寫的（這些碑誌在全集中可以看到）。總之，最高統治者們都很敬重他。

武帝建德四年（公元五七五年），信六十四歲時，周陳通好，允許留在北朝的梁朝官員及南來羣士回其本鄉，但武帝只放王克、殷不害等人，庾信和另一詩人王褒却捨不得遣反，周帝對詩人的愛惜使他失去了最後一次投回祖國懷抱的機會。那時信在作洛州刺史，他爲官清正，深得人民的愛戴。後來徵召回朝爲司宗中大夫。六十七歲時因病離職，這年滕王道給他編全集。

隋文帝開皇元年（公元五八一年）秋天或冬天，詩人逝世了，享年六十九歲。

詩人晚年官位極高，物質生活是非常優越的，但是這彌補不了他精神生活上的缺憾（他的

悲劇生涯的特殊性就表現在這裏）。在作品中，他屢次表現他不願作高官、享厚爵，打算隱居，但爲時勢所逼，不能如願——他始終是痛苦的。喪家亡國，失身敵，兒女、外孫、母親的相繼喪亡，羈旅異國，即將老死他鄉……一切的一切都落空了，完了，詩人是在這樣飲泣吞聲含淚中死去的！

庾信的一生可以分爲前後兩個時期，這兩個時期是以侯景之亂，魏陷江陵——梁亡爲分界線。第一個時期是四十二歲以前在梁作官，一切如意時期；第二個時期是四十二歲以後聘魏，因梁亡留魏仕周，不得遣還，羈旅異國，一直到死的失意（指精神上的失意）時期。因此他的作品內容和風格也隨着這兩個時期而有所不同。決定這兩個時期作品內容和風格的不同，主要的是詩人不同的生活經歷、生活環境、生活內容，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不同的精神狀態。

第一個時期：包括詩人的童少年、青壯年。這時由於他所處的家庭環境有着濃厚的文學氣息，給他的創作打下了穩固的基礎。我們知道詩人的父親在當時是一個『文詞高於甲觀，楷模盛於漳濱』的有才華的人物，因此可以想像得到家庭一定瀰漫着濃厚的文學氣氛。庾信的文學修養是受到這種氣氛的強烈薰陶，文學才能也是在這樣的氣氛中萌芽滋長的。滕王道在

庾信全集的序中說：『若乃德聖兩禮，韓魯四詩，九略七流之文，萬卷百家之說；名山海上，金匱玉版之書；魯壁魏墳，縹帙紺囊之記；窮其枝葉，誦其篇簡。』由此可知他是一個讀通了無數古代經典書籍的人。假如沒有那種家庭環境，他是不可能讀到那些珍貴的書籍的。在當時，不論作詩或作文都要一句一典的風氣中，如果不精讀這些書，似乎便難以寫出好的作品（當然這種讀書，使他接受了前輩文學中現實主義成分，下文詳談）。另外由於父親在宮廷中顯貴的地位，使得他很早就接近了當時最高的統治者——皇帝和太子。十五歲時，就在東宮給昭明太子伴讀。和他們親密的接觸，對詩人早期作品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梁朝諸帝從蕭衍、蕭統、蕭綱到蕭繹，他們都是熱愛詩歌並致力於創作的帝王，而簡文帝（蕭綱，詩人非常敬佩他）又是宮體詩的集大成者，其他幾個皇帝也寫了大量的宮體詩。當時由於皇帝的提倡，宮體詩的盛行遍及朝野。庾信由於本人生活的貧乏，風氣的沾染，以及要迎合帝王們的口味，因此早期也寫過許多內容空虛的、輕浮的、綺艷的宮體詩。這些作品，除了描寫吃飽了飯無所事事的士大夫階級的無聊奢侈生活——風花雪月，醇酒美人，歌舞舞影，香脂白粉……等——之外，可以說一無所有。在那耀眼的華麗的軀殼下，擁抱着的是浮空虛幻的靈魂，據庾信本傳說：『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文並綺艷，故世號「徐庾體」。』可知詩人早年寫了許多屬於這類的作品。賦如鏡賦、

燈賦、蕩子賦、詩如和詠舞等，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早期作品的基本特色。

此外在他早期作品中有模擬樂府之作（這種模擬可能和梁帝們的大量模擬有關）。他們也都有模擬樂府的作品，如武帝有臨高臺，簡文帝有藍歌篇十八韻）。如舞媚娘、結客少年場行，這種模擬對於詩人作品是有意義的。它使得他在不知不覺中被民歌所影響。有些詩如閨怨、弄琴二首等，都有民歌化的傾向。它們在體裁上可能是模倣民間短歌，從作品中樸素自然的語言和具有民歌風格這點來看，詩人受到的影響確實並不輕。

第二個時期，由於他的生活環境的驟變，詩人的創作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在『胡馬哀吟，羌笛悽嘯』之聲充塞耳邊的陌生環境中，填滿了他的胸臆的是那喪家亡國之痛，羈留異國之悲，失身仕敵、沾污祖先、對人民毫無裨益的恥辱和痛苦，在敵人統治下作官的恐懼與憂慮（周宗室內部的互相殘殺，更使他不能不有此感），人到暮年一切希望都幻滅的哀傷……。總之，數不盡的憂慮悲愁像毒蛇似地噬着他衰老的麻木了的心靈，陰影似地籠罩着充滿創傷的心扉，『危慮風霜積，窮愁歲月侵，留蛇常疾首，映弩屢驚心』（臥疾窮愁）：這難道不正是詩人當時心境的真實的寫照嗎！假如我們說早期的作品只是作為高高在上的統治階級精力過剩的消遣、排洩，作為不滿足於這種充滿聲色的現實生活的自我陶醉；那麼現在他不需要這種陶醉，也不需

要這種消遣、排洩。後期詩賦作品的寫作動機和態度可以說完全改變了，它們都是亡國之後羈留長安時寫的。在那裏，詩人無法向任何人傾訴自己的情懷，披露自己真實的靈魂面貌，於是把那種鬱結在內心深處的情緒一瀉無餘地通過筆傾流在紙上。晚年的大部分詩賦作品都是本着他自己提出的『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的原則來進行創作。因此那種靡靡之音已經聽不到了（或者說不容易再聽到）；那種綺豔浮華的風格也見不到了（或者說不易再見到）。代替它的是那深沉的真摯的由內心迸發出來、為血淚所浸漬的詩句。由於內容上的變化，那些如江潮奔湧的悲哀之情已經不是有一定拘束性的駢體所能束縛得住，它需要在某種程度上予以突破，例如在對稱排偶之中出現了些散文化的句子，語言的運用和組織是多變化的（這問題下文詳談）。讀了他的後期的作品，我們好像聽到一曲格調慷慨悽涼、氣魄宏偉瑰麗的悲歌。

我們認為後期作品中產生的那種風格，一方面主要的是由於詩人的悲劇生涯——他所處的不幸的環境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生活內容和思想感情造成的。但另一方面，由於他生活在北方，北方民族的豪放性格，荒涼嚴寒廣袤的自然環境，以及北方民歌中的那種『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樸素遼闊的詩的意境也都給他以極其深巨的影響。（可以這樣說，如

果詩人在南方，即使更不幸，恐怕也只能寫出一篇篇充滿纏綿悱惻的哀怨的作品。）我們只要舉袁江南賦中的幾句作例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於時瓦解冰泮，風飛電散；渾然千里，滔洩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嘆！』

其中『隴水』句典本北歌隴頭歌辭：『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腸斷絕。』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構成這幾句詩的悲壯蒼涼的風格是和北方的自然環境，以及北方民歌情調的影響分不開的。在庾信後期作品中，這種影響比比皆是。

庾信最有價值的作品都是後期寫出的。真的，如果沒有後期那種遭遇，他是不可能創造出那種用血和淚凝結成的動人心弦的詩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得對：『信北遷後，閱歷既久，學問彌深，所作皆華實相映，情文兼至，抽黃對白之中，灑氣舒卷，則非陵（徐陵）所能及矣！』

庾信的作品是直接繼承了我國古代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這條路線的。儘管他早期寫了許多宮體詩，後期作品還是以駢文形式來進行寫作，但是其主要方面，他的創作的核心——是現

實主義。

庾信所繼承的是由左傳楚辭及魏晉時期王粲阮籍等人的作品的現實主義傳統。據周書庾信本傳：『信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可知他受左傳的影響最深，從他後期作品中不論敍事或抒情都常引左傳之事為喻可知。左傳敍事的真實性，以及敍事時含有作者的見解成分（據古代的看法，認為左傳不是單純記載歷史，而且還有更深的作者的政治見解寄托在字裏行間），楚辭中離騷的抒情敍事的體裁，屈原抒發自己理想無法實現的哀傷和憤怒，都給庾信作品起了示範作用。哀江南賦中的抒情敍事體裁，以及以個人身世為骨幹來敍述家國的淪亡，在敍述時局變遷過程中，字里行間寓有詩人的政治見解的方法，都是由以上那些古代作品中吸取來的，不管他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至於擬詠懷詩二十四首，更可以看出他模擬古人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詩作的內容和形式來表現自己處在敵人統治下不能明顯表現的情懷。詩人學習屈原和阮籍並非偶然的，因為屈原被流放的命運，阮籍的恐禍憂患的心理是和他當時的處境和精神狀態有相同之處，因此在學習他們時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極其自然的，不論形式和內容都已經過詩人的消化。

接着我們就可以直接來評價詩人作品的人民性、現實性及其美學價值。要評價這些東西，

必須從這幾方面着手：詩人所表達的感情在那個社會中是否具有典型性？他作品中所反映的社會現實面貌是否和當時的相符合？通過他的描繪我們能否真實地看到當時人們是怎樣生活的？

我們認為詩人所表達的情感是具有典型性的，對當時那個時代以及對其他時代社會來說都是這樣。首先我們認為在他的詩賦中的『惟以悲哀爲主』的『危苦之辭』所表現的亡國之痛和鄉關之思是真摯的，沒有一些矯揉造作。這點我們的大詩人杜甫會在他所寫的詠懷古跡詩中肯定過。其次我們可以來探討他以『危苦之辭』所表達的『鄉關之思』的具體內容，因爲這個內容決定了這種思念鄉關之情能否更多和更普遍地引起人們靈魂的震盪，是否具有典型性。

一、詩人懷念的主要不是以前自己的那個顯赫安樂，高官受寵的生活（當然也有些，下文再談）。因爲在這裏（在北周），他的位望比以前要通顯得多。在極端痛苦之時，他懷念着那過去曾經繁榮富強——那時在遼闊富饒的祖國大地上從朝廷到草野處處彌漫着歌舞聲影，草麗花香，和平逸豫的歡樂氣氛——的祖國，而現在已經崩潰敗亡，昔日的繁華『莫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到處散佈着的是『鬼火亂於平林，殞魄遊於新市』的淒慘陰森令人毛骨